

近代数学の選書

子明



現代文選

子

近代散文选析

王祖猷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7,000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统一书号: 10276·13 定价: 1.50元

前 言

清代的散文，在鸦片战争前的一百多年中，一直以桐城派为正宗。桐城古文派以程朱理学为“道统”，以“韩柳欧苏”为“文统”，并提出“义法”主张。这一文派在内容上要求“言有物”，“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宣扬的主要是封建道德；在形式上要求“言有序”，讲求章法严紧，选材精当，文辞“雅洁”，他们提倡的“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主要指文章的形式技巧。当时，戴东原、章学诚、李兆洛等对桐城派曾加以非议。王若霖甚至讽刺方苞“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袁枚则感慨：“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由于桐城派标榜的“义法”适应了统治者利用古文加强思想统治的需要，因而尽管有人反对，但它仍居正统地位。鸦片战争后，散文随着时代剧变发生深刻的变化，桐城古文的正宗地位动摇了。其后虽有曾国藩的“中兴”（代表了桐城派在政治上最反动的一面），但是在整个晚清，它的影响已日见微弱。一种改革后的充满活力的新体散文取代了桐城派及其他复古派的散文，成为近代散文的主流。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一重大变化，导致整个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发生剧变。文学也随着出现深刻的变化，散文则是其中变化得最为显著的文学体裁之一。它的发展，可以分三个阶段。

近代散文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以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散文。

古代散文发展到近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发轫于龚自珍、魏源。龚、魏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受经今文学派影响，倡“经世致用”之学。龚自珍“以经术作政论”，“以朝政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魏源《定庵文录序》），“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议天下事”（见佚名《定庵文集》后记）。魏源“喜经世之略”，曾编选顾炎武、王夫之以来的政治、思想论文为《皇朝经世文编》，作为散文典范，并作《海国图志》，以“御外夷”为主旨。他们首开改革风气，将散文创作引上“经世致用”的道路。龚、魏虽然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但因为敢于面对现实，预见社会危机，提出改革主张，召唤时代风雷，所以他们的“致用”，关系社会治乱、国计民生，与桐城派古文为康、雍、乾“鼓吹休明”大相径庭，与经古文学派的泥古守旧、专事考据也完全不同。他们为散文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不仅反映了新的内容，表达出新的思想，而且也给散文形式带来变化，如文笔自由恣纵、不受拘束，长于说理、不尚辞藻等。

龚自珍的散文，总的说来在内容上具有批判精神，在形式上不受约束。他的一部分散文引古喻今，“讥切时政，诋排专制”（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如《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思想深刻，辞锋犀利。另一部分散文，则表现出反帝爱国的思想，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已佚）等。《送钦差侯官林公序》是龚自珍反帝爱国篇章中有代表性的一篇。这篇文章并无只字叙及个人友情，阐述的完全是关于禁烟的大计。在文章中他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英国鸦片输入、支持林则徐严格禁烟的爱国立场，并提出加强军事准备，以对付英国

武装入侵的正确主张。龚自珍还有不少杂文和寓言式的散文，如《尊隐》、《捕蜮》、《病梅馆记》等，也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由于文网严密，他便用隐喻及寓言的方式揭露“衰世”，斥责统治者扼杀人才，并表示了对未来的希望，表现出启蒙思想的特色。龚自珍的一些记事散文，如《书金伶》、《吴之癯》、《杭大宗轶事状》，直接揭露了清廷的种族压迫政策和最高统治者的狠毒，同样具有很强的针砭作用。

魏源的散文，政论文居多，主要内容是提出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主张。他的《海国图志》一百卷，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第一次详尽地叙述了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地理、历史、政治情况。其《圣武记》虽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及肯定清廷镇压少数民族起义等不足，但其中也表现出抵御外侮的思想。这两部书都具有总结鸦片战争经验教训的意义，表达了改革社会以反对外国侵略、振兴国家的思想。并且把社会改革与了解西方结合起来，引导人们进一步睁开眼睛看世界，对中国人民了解西方情况具有很大的作用。

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最早提出开展禁烟运动的黄爵滋等，也都在这时写下了不少关心时政抵御外侮的“经世”散文。因此，以龚、魏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在近代社会发生变化的初期，就把散文创作从桐城派的“阐道翼教”转到“经世致用”的道路上，为近代散文的改革开辟了正确的道路。

近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冯桂芬、薛福成等人代表的冲破传统古文束缚向新文体过渡时期的散文。

龚、魏开改革风气后，近代散文随着鸦片战争后社会的剧变，在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期间又获得了发展。进步的知识分子、早期改良派人士逐步摆脱传统古文束缚，扩大了散文内容，运用散文“记事述情”，表达改革社会与御侮图强的思想内容。

林则徐的学生冯桂芬是这一时期散文改革的积极倡导者。龚、魏从政治需要进行散文改革，冯桂芬则从文学本身提出散文的改革。他在《复庄卫生书》中指出“文者，所以载道也”，但是“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谓，举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数”，“无一不可著之于文”，“不烦绳削而自合，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也”。他把反桐城“义法”、扩大散文内容、突破形式束缚联系在一起，作为散文改革的内容提了出来。他的散文基本上实现了他的主张，其代表作《校邠庐抗议》四十二篇，内容广泛，从“筹国用”、“改科举”，到“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都与社会改革直接有关，对后来的散文改革和变法维新具有先导作用。

冯桂芬稍后的早期改良派人物薛福成、王韬等，大量写作散文，对散文的改革都起了推动作用。薛福成早期参加洋务活动，受桐城派影响较大，是曾（国藩）门四大弟子之一。但他后来出使外国，接触西方科学，注意到发展民族工业的重要性，成为早期改良派。他在散文创作上也抛弃了桐城派的一套。因主张用散文介绍西方物质文明，提倡维新变革，故“不遽复研古文辞”（《庸庵文编·自序》）。他的散文脱离了传统古文派的束缚，叙事清楚，说理明白，平易晓畅而趋于解放。其作品数量很多，大多数为阐述改革主张的论文，如《敌情》、《变法》、《枪炮说》、《振百工说》等。他的散文还有杂记、游记等，都寄寓御侮图强的思想。《观巴黎油画记》为其短篇中的佳作。文章通过观赏普法交战的油画，交代法国人作画意图，表达了鼓励国人洗刷国耻的爱国思想，一直被人们传诵。

王韬长期在香港编译书籍，主编报纸，鼓吹变法自强，并曾去日本。他接触西学更多，其散文创作大量用于介绍西方科学及政治经济情况。他自述对于“古文辞之门径则茫然未有所

知，敢谢不敏”，并提出自己作文的标准说：“文章所贵在平纪事迹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言，斯即佳文”（见《骝园文录外编·自序》）。因而他的散文更摆脱传统古文的影响。其政论文代表作《变法》、《变法自强》上中下篇，其中有对社会弊端的揭露，更多的是改革建议。他的《日本杂事诗序》，最早评价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成就，影响很大。

冯桂芬之后对散文改革有贡献的除薛福成、王韬外，尚有郑观应、马建忠等。郑观应的代表作《盛世危言》，大量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特点，是他“感慨时事”之作，其中多“愤激之词”（《盛世危言·自序》），对扩大改良思想起了作用。马建忠的散文集《适可斋纪言纪行》，大多提出维新主张。

冯桂芬、薛福成等一批早期改良派散文作家，在龚、魏开创的“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抛开桐城派及其他古文派束缚，使散文成为服务于社会改良的重要工具。于此同时，太平天国的革命家制定了革命的语文政策，1861年颁发了由洪仁玕等署名的《戒浮文巧言谕》，提出“文以纪实”、“言贵从心”、“弃伪从真”、“去浮存实”的原则，倡导阐发“真道”、符合“天情”，直接为农民革命服务的新的文学，提倡“实叙其事”“朴实明晓”的文风。他们的这一主张对于桐城派及一切封建古文都有摧陷廓清的作用。太平天国革命家的散文，都体现了其语文政策的革命精神，洪、杨的诗文如此，他们的文奏、书简、传记也是这样。《赖文光自述》是其中出色的一篇。它既表现了英雄忠于革命事业、宁死不屈的精神，又在文风上显示出“纪实”与“朴实明晓”的特点。

近代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曲折与逆流。这便是曾国藩所领导的桐城古文的“中兴”。最先对桐城“中

兴”起作用的是梅曾亮。他是姚鼐弟子，故标榜桐城古文。其作品“清淡简朴”，但现实性不强。少数篇章如《小盘谷记》、《书棚民事》有一定的意义。梅曾亮之后，曾国藩继起，他在武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同时，用复兴桐城古文来抵制太平天国的语文改革。他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加上“经济”，实际上用为反动政治服务的“经济”代替“义理考据”。他编了《经史百家杂钞》，以扩大桐城派的内容，使桐城派古文更能适应其政治需要。由于曾国藩利用自己在统治阶级中的地位与影响，来提倡桐城派古文，罗致一些人在周围，因而出现桐城古文一时的繁荣景象。这与龚、魏正视现实揭露社会矛盾的倾向是背道而驰的。故桐城“中兴”，实际上是散文发展中的逆流。但是，其中有一些作者，如俞樾、王闿运、张裕钊、吴汝纶及早期的薛福成等，其创作也有可取之处。当时受桐城派影响刻苦自学的吴敏树，创作较有成就。他的《说钓》讽刺世态，嘲笑热衷官禄者，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近代散文发展的第二阶段虽有逆流、曲折，但冯桂芬等反对桐城“义法”，薛福成等冲破传统古文束缚，进行了散文本身的改革。他们的散文普遍地用来阐述变革主张，表现了向新文体的过渡，说明散文的改革、发展已成为不可改变的潮流。

近代散文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以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宣传维新变法、介绍西学的自由通俗的文言——“新文体”。

近代散文在甲午战争以后，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发展成为一种完全摆脱一切古文家法、自由活泼、富于鼓动性的报章文体——“新文体”。新文体不仅在形式上作了革新，在内容上也直接表达了变法维新思想，故这一阶段的变化为其他时期所不能比拟。

首先，新文体的兴盛，受了龚、魏“经世致用”的思想影响。

梁启超曾总结说：“光绪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见《清代学术概论》）龚自珍作《平均篇》、《乙丙之际著议》，康有为作《上清帝第五书》、《应诏统筹全局折》，它们极为相似，可看出康有为受龚自珍的影响。“新文体”与冯桂芬以来的散文改革也密切有关。梁启超与冯桂芬一样“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王韬作《变法》、《变法自强》，梁启超也作《变法通议》等，精神与之相通。王韬自谓作文“下笔不能自休”，梁启超也是“下笔不能自休”（见《清代学术概论·自序》），可见受他们的影响很深。

其次，“新文体”的形成与社会变化直接有关。甲午战争后，康、梁出于救亡图强的爱国思想，积极进行变法维新的活动。他们代表正在壮大的新的民族资产阶级，批判洋务运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学习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为了宣传这一主张，他们提倡“文界革命”。这样，一种富于鼓动性、能为广大群众所阅读的文体也就应运而生了。

此外，新文体的流行，与翻译文学的影响，报刊事业的发达也有很大关系。改良派要介绍西方科学，进行翻译，所以出现了大量新的词语、句式，散文形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康、梁宣传变法，都首先运用报刊为工具，他们在北京、上海、天津办《强学报》、《时务报》、《国闻周报》，后来又办《新民报》，“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见《清议报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梁启超说：“自报章兴，吾国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派家法，无复问者。”所以“新文体”又称“报章体”、“新民体”。

新文体作家以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但康有为的文章是新

文体的先导。康有为作《强学会序》，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之祸迫在眉睫，痛陈亡国以后之惨状，激励人们变法图强，“读之者多为之下泪，故热血震荡，民气渐伸”（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改革起源》）。他的《上清帝第五书》，一方面指出时局危急，警告统治者；一方面提出三大改革策略，在当时发生了很大影响。康有为的散文能广泛运用古今中外典实，说理透彻，语言多排比，汪洋恣肆，富于气势，对新文体发展起了开拓作用。

谭嗣同开始学桐城古文，后来又习魏晋散文，最后由于提倡改良革新，摆脱古文束缚，文章为之一变。他大声疾呼：写作要“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罗网”（《仁学·自序》）。他的代表作《仁学》，在内容上有强烈的反封建反传统精神。由于吸取了骈文的“体例气息”，文章风格豪放奔腾、明快犀利。他的抒情、记事散文，如《城南思旧铭并序》、《先仲兄行述》，都写得极有感情。

梁启超的名字与新文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且被誉为“舆论界的骄子”、“天纵之文豪”。在理论上，他极力反对八股文、桐城古文，指出八股文“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同时，认为桐城古文“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阙创获，无益于社会”（《清代学术概论》）。由于他深感于时文与桐城古文不能适应其变法维新的政治要求，故在思想上认识到进一步使文体获得解放的必要性，从而提出“文界革命”。他说：“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介绍新著·原富》）。梁启超依据宣传变法图强的需要大量写作了不受束缚、不遵传统古文法则的自由通俗而有鼓动性的新

体散文。发表在《时务报》上的《变法通议》，是他早期有影响的散文著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梁启超新文体的特点。其后的《少年中国说》、《呵旁观者文》、《新民说》等则更是典型的新文。《少年中国说》批判了封建主义顽固派的腐朽，阐述了建立“少年中国”——资产阶级富强国家——的理想，感情饱满，气势磅礴，自由恣纵，毫无拘束，“条理清晰，平易畅达”，大量运用排比、比喻，充分表现了梁启超新文体的特色。如在文章中，他对比老年中国与理想中未来的少年中国的不同，说：

“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

文章的结尾，作者描写他理想中的未来中国。说：

“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萋萋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当然，梁启超的新文体也有不足。最主要的是用语的重复、雷同，行文的拖沓、冗长而不精炼。章太炎说梁的散文“观其流势，洋洋洒洒，即实不过数语”。这话未免过分，但梁文“委蛇沓复之病”（《中国人种之将来》），也确实存在，并且残存骈文痕迹。

在改良派人物中，也有沿用魏晋古文进行写作译著的。稍早于梁启超、谭嗣同的严复、林纾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严复早期接触过大量西方著作，具有爱国思想，提倡学习西方政治、文化，进行变法。他是近代史上第一个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文化思想的人。《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都是由他首先用古雅的文言翻译过来的。除了翻译介绍西方学说外，严复也写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论文。早在甲午战争后，他就写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论文，震动海内。《辟韩》是其中重要的一篇。通过批判韩愈维护等级制的《原道》，表达了反封建专制主义，要求实行君主立宪、伸张民权，致国家于富强的爱国思想，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他坚守“雅言”的传统，因而限制了文章的宣传功能。梁启超因此批评他“太务雅渊，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绍介新著·原富》）。

与严复同时的林纾，早期也具有反帝爱国思想。他认识到“欲开中国之民智，道在多译有关政治思想之小说始”（邱炜菱《客运庐小说话》）。他大量翻译西方小说，其中《黑奴吁天录》、《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传略》等影响为最大。他虽通过别人口述而进行意译，但文笔流畅生动，不象严复文字那样古奥。他的散文，如《湖之鱼》、《记九溪十八涧》等，写得也很好。林纾为翻译作品写了不少序言，表明他要用这些译作振起国民尚武复仇精神，其中有不少佳作。如他的《不如归序》，通过外人对甲午海战时中国将士的死战的记述，歌颂了海军将士的英勇牺牲精神，表现出作者的爱国思想。但林纾后期同严复一样，都趋于保守反动，在散文创作上也走向复古。

二十世纪初到辛亥革命时期，近代散文随着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而成为宣传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派宣传家在《苏报》、

《民报》、《中国女报》等革命刊物上大量发表文章。这些作品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与爱国民主的思想倾向，言辞激烈，感情激昂，受新文体影响很大，但一般没有梁启超文章重复拖沓的缺点。其作者以章炳麟、陈天华、邹容等为代表。

章炳麟是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又是国学大师。他早期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运用散文宣传排满革命，批判改良派，“所向披靡，令人神往”（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其著名的作品如1903年写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中国只可立宪，不可革命”的保皇思想，引用民族压迫的血的事例，对清廷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使很多受康有为思想影响的人觉悟过来。作于日本的《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书》，深刻揭露了清廷统治者的罪恶，表现了强烈的排满革命思想。其《革命军序》肯定了邹容《革命军》“辞多恣侈，无所迴避”的特点，批判了“文墨议论”的“蕴藉”，表现了他对散文改革的进步观点。但章炳麟前期散文也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后期则“退居于宁静的学者”，在散文创作上趋于复古，完全放弃通俗化的主张。他的多数散文，文字古奥，好用冷词僻典，大大限制了宣传作用。

邹容是激进的革命派，他的《革命军》愤怒地揭露了清廷的反动腐朽，大声疾呼进行反清的民主革命，是当时革命派言辞最激烈的作品。全书充满激情，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文字又没有章炳麟古奥的缺点，出版后畅销国内，如炸弹掷向敌人，对鼓舞青年走向革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他与其他民主革命派一样，也有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

陈天华是杰出的民主革命宣传家，曾编辑过《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等刊物，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揭露封建统治、宣传民主革命的文章。他的主要著作是用说唱文体写作的，如《猛

回头》、《警世钟》。作品揭露了帝国主义压迫与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鞭挞了清廷投降卖国的行径，并号召人们起来推翻这“洋人的朝廷”，把反帝与反封建联系了起来，对传播革命思想的作用极大。秋瑾等革命志士都曾受过其影响，从中认识革命道理而投身革命斗争。日本颁布《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后，陈天华为激励留学生爱国之心，愤而投海。他在蹈海前所作的《绝命辞》，沉痛感人，在革命青年中引起震动。

女革命家秋瑾大力从事妇女解放与民主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并直接计划领导起义。在文学上她主要从事诗词创作，但也创办过《中国女报》，写过一些有影响的散文。《〈中国女报〉发刊词》是其中重要的一篇。它揭露了社会的黑暗，也指出留学生中的倒退现象，号召妇女团结起来投入革命斗争。文章热情洋溢，具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除陈天华、邹容、秋瑾等革命家运用浅近流畅的散文作为宣传革命的武器外，一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烈士，也留下一些感人的散文，如方声洞的《起义前别父书》、林觉民的《与妻书》等。这些作品闪耀着崇高的思想，表现了革命的牺牲精神，包含着真挚动人的感情。因为这些作品是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所以一直激励人们奋进，广为后人传诵。

此外，革命派作家中也有一部分人在散文创作上持复古倾向，如后期的章炳麟与《国粹学报》的邓实等人，以及“南社”中一些作家。高旭的《南社启》就指责梁启超师法欧美和日本为“醉心欧美”，林獬说，学习日本的文学是“自弃国粹”。他们提倡保存国粹，反对了民族虚无主义。但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说，其倾向是保守落后的。不过，南社作家为纪念死难烈士，抨击反动统治，也写了不少好文章。这是近代后期散文创作的一个成就。如柳亚子的《丹徒赵君传》、《鉴湖女侠秋君墓碑》，

还有陈去病写的《徐自华传》，都成功地表现了民主革命思想，赞扬了革命牺牲精神，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综观近代散文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总的趋势：

其一，从思想内容看，散文与现实斗争的关系日益紧密。鸦片战争前夕，社会危机显露，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以散文“讥切时政，抵排专制”，魏源作《海国图志》，“师夷长技以制夷”；太平天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王朝危机加深，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阐述“为治”之道，薛福成、王韬等早期改良派用散文陈述改良思想；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改良主义趋于高涨，康有为作《上清帝书》、梁启超作《变法通议》，直接用散文宣传变法图强主张；戊戌政变后民主革命进入高潮，章太炎写《与康有为议革命书》，邹容作《革命军》，运用散文批判改良主义，作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工具。总之，近代散文在其发展中，为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服务，与现实斗争关系日益密切。这是近代散文发展的第一个趋势。

其二，从艺术表现看，近代散文的形式日趋解放，语言也日益通俗化、口语化。鸦片战争前夕，文网甚严，传统古文的影响很深，故龚自珍散文多“瑰丽之辞”、“意不谲达”，但也表现出狂放不羁、“舒纵易效”，开始突破古文藩篱；而魏源的散文已能做到“深入而显出”，标志着语言开始变化。其后，太平天国制订为农民革命服务的语文政策，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强调一切文字“总须切实明透，使人一目了然”（《戒浮文巧言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冯桂芬提出“不矜绳削而自会，称心而言，不必有义法”，其他早期改良派作家薛福成等的散文也都逐渐摆脱古文形式的束缚而趋向社会化、通俗化。到了戊戌时期，梁启超提出必须“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形成“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

(《清代学术概论》)的通俗而生动的文言。民主革命派秋瑾、邹容、陈天华等作家受“新文体”的影响较深，进一步使用“言文参半”及通俗文体宣传革命，使近代散文的形式更趋解放、自由，语言也更加口语化，并向白话文过渡。因此，形式的不断解放，语言的日趋通俗化、口语化，是近代散文发展的又一趋势。

近代散文上承古代散文，下接现代散文，是由古代散文向现代散文的过渡。与整个近代文学一样，近代散文也处于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之中。它以自己强烈的政治倾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内容，爱国与民主的思想，显示其时代特色。今天我们介绍它、阅读它，一方面可以用它激发爱国思想，为振兴中华的伟大使命服务；同时，因为它是古老的文言向现代白话文过渡的转折关头，所以研究它的发展与特点，对于我们总结经验，为今天的散文发展提供借鉴，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最后关于本书的编选工作，作一些说明。

近代历史虽不长，但作为重要的斗争工具的近代散文数量很大；此外，近代散文作为近代历史生活的反映，也有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现在选出的篇目，尽量注意到了作品本身的成就，同时也照顾到时代与作家的代表性。但无产阶级革命家、作家在“五四”前的作品，因属新文学范畴，所以未加选录。

近代散文的艺术成就虽不高，但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即具有较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一定的作用。所以选文主要依据这一标准，同时也兼顾到艺术上的成就。篇目有限，挂一漏万，势所难免，有待补充。

近代散文总的说比古代散文通俗，但部分作家的文字深奥，用典较多，所以注释不能过简。我们在注释字词的同时，